

「抗戰史之研究」學術座談會

許秀孟 國史館修纂處研究助理

壹、呂芳上館長致詞

非常歡迎各位學者朋友來到國史館參加抗戰史研究座談會。本館近年來希望能修纂抗戰的歷史，為準備起見，特地邀請各位專家來此談談抗戰史研究的議題，並交流觀點，提供國史館未來修纂的參考與方向。我想先提幾點作為引言。

以目前所見，抗戰史的相關研究仍稱不足，海峽兩岸尚未有被人公認較具全面性與完整性的抗日戰爭史著作。過去雖有些研究成果，如吳相湘教授早在 1973-74 年寫就的上下兩冊《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也出版了一套戰史，但要說內涵豐富材料、深具觀點的著作，尚難以見得。相對於學術研究，史料的出版品則不少，日本與美國先後都有編修出版，但基本上都還是不夠的。在國際上有關二次大戰史的書寫中，就相對缺乏中國戰場的地位與歷史記載，這個癥結點出在國共鬥爭的歷史因素。因為國共兩黨都互相指責對方未負抗戰責任，在國家內爭下，難免對歷史做出偏頗的詮釋，如國民黨認為中共借抗戰時機坐大，膨脹自己的力量；共產黨則認為國民黨消極抗戰、志在反共。影響所及，大陸學者多將中國戰場劃分成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正面戰場屬於國民政府，敵後戰場屬於中共，而真正作戰的是中共的敵後戰場。

這種觀點在近年則有逐漸被打破的趨勢，顯示研究視角開始有轉化的跡象。以平

「抗戰史之研究」學術座談會係於 2012 年 3 月 8 日上午假國史館臺北辦公室一樓推廣教室召開，與談人包括胡德坤、韓永利、彭敦文、傅應川、張瑞德、劉維開、段瑞聰、島田美和。

型關為例，過去大陸地區一向擴大宣揚平型關戰役的貢獻，但近年大陸學者轉而公開承認平型關戰役的規模，最多只能稱為戰鬥，而非一場大戰役。新觀點的提出說明研究有了新的契機。但海峽兩岸若要對抗戰史求取一個平衡、客觀的看法，必須面對幾個先決條件，第一是要拋棄黨見，站在中國的立場來看問題；第二是不要常引用偉人的話，蔣說、毛說不再是圭臬；第三是消除意識形態，即史觀的問題，應探求歷史發生什麼，而非歷史應發生什麼。武漢大學歷史系的抗戰史研究就提供一個很好的參照，以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中國抗戰，這還有望各位學者稍後的引介。

再是，抗戰史議題的多元化，例如軍事戰爭除了戰役研究之外，尚可研究軍隊史，討論軍隊的兵員訓練、戰力、將兵關係、後勤等。而戰場以外，社會變化亦是抗戰史的一環。經濟、財政、政治、文教事業的對應變動、戰爭帶來的人口流動、戰爭體制的設定與調整、國際關係、民間通俗文化的發展、戰前準備、戰後的後遺症，以及女性的角色等等議題，都能豐富抗戰史研究的面向。

貳、胡德坤教授介紹大陸有關抗戰史著作

關於中日戰爭研究，武漢大學的研究團隊，將其研究成果集結成《反法西斯戰爭時

期的中國與世界研究》九卷本著作。本書以獨特的視角、新穎的觀點曾引起了大陸學術界的關注，因此今天主要介紹策劃九卷本著作的出發點、基本構思和主要內容。

一、策劃《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研究》九卷本的出發點

武漢大學是大陸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學術重鎮，大約於1970年代末開始進行相關研究。由於中國在戰時已被公認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國之一，但因1950年代以後的冷戰格局，且中蘇關係破裂，導致歐美及蘇聯的史學著作對中國戰場的討論付之闕如。若要還原歷史的面目，有必要深入研究中國抗日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與作用，並將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另一方面，由於學科的分割，中國抗戰史與二次大戰史的研究甚少放在同一脈絡裡討論，導致戰時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問題，容易遭到忽視。再加上兩岸長期處於對立狀態，過分強調國共的鬥爭，這對國際學術界正確評價中國抗戰的地位與作用，也產生負面影響。

二、九卷本著作的基本構思

第一、二、三卷主要從中國抗日戰爭對日本世界戰略的牽制與制約作用、中國抗日戰爭對美、英在東亞戰略的支撐作用、中國抗日戰爭對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推動和維護作用等角度，探討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地位；第四、五卷主要探討戰時中國的外

交戰略，以及其對國際地位的提升、對廢除西方對華不平等條約等方面的作用；第六、七、八、九卷主要探討戰時美、英、蘇、德等國的對華政策。從總體上看，前五卷是從中國角度看世界，後四卷是從世界角度看中國，體現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與作用。

三、九卷本著作對中國抗日戰爭歷史地位的探討

本書認為中國抗日戰爭在二戰中的歷史地位可歸結六個要點：

（一）中國開闢了世界上第一個「反法西斯戰場」，從九一八事變的局部抗戰，到七七事變後的全面抗戰。（二）中國抗戰牽制了日本的北進戰略，有力地支援了蘇聯對德戰爭。（三）中國抗戰牽制了日本的南進戰略，有力地支援了美、英的太平洋戰爭。（四）在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抗戰還牽制了日本西進印度、中東的西進戰略計畫。（五）中國抗戰牽制了日本的結盟戰略，使日德同盟貌合神離。（六）中國抗戰推動了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建立，在戰後國際新秩序建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書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中國的抗日戰爭，希望藉此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叁、傅應川副理事長談抗日軍事戰爭的發展

本次擬從宏觀的角度來談整個抗戰軍事的发展過程。首先論證中國戰場的主動性。從戰前準備開始，德國軍事顧問團即給蔣中正戰略建議，包括國防計畫、軍隊訓練、建設軍備工業等，國民政府隨後也擬定了對日作戰計畫。由此可證，蔣一直有與日本一戰的心理準備，然因國力過於懸殊，對於何時開戰並無確切把握。所以在七七事變爆發後，到達「最後關頭」，於是下定決心與之一戰。

此外，在1935年的中國戰略計畫書中，清楚表明了不能丟掉沿海各省，所以國軍擬在沿海預備開戰。但實際上蔣把湯恩伯等中央軍往北調，準備在華北繼續作戰，如此威脅到日軍在華北的戰略，並破壞其戰役部署，使其轉進西北察哈爾，一直到山西。且在淞滬戰役時，中國即採取了主動攻勢，因日本原只留有兩個師團，以避免擴大戰端，但隨著國軍的攻勢，而急增到九個師團，可以說日本是隨著中國的攻勢而走，國軍確實掌握了主動權。淞滬會戰完畢後，日軍還有力量攻向南京，但在武漢會戰後，日軍則耗損過大，必須重新部署下一期戰役，由此中日變成戰力相持的階段。

再是論證武漢會戰成為如此關鍵性的戰役，在於其達到國軍持久抗戰的目標，破壞日軍的速戰速決策略，用時間、空間確保了

有限力量，使其可以部署長期作戰的準備。而武漢會戰後，國軍轉而採取正規戰與游擊戰同時並進的戰略，這個決策讓共產黨有發展的機會。軍事委員會曾下令所有的國軍部隊不准退過黃河，成立游擊戰區，使戰區底下有更小的游擊區，並將游擊部隊指揮權交給戰區司令官，而軍事委員會只作後部支援，例如第一戰區就變成晉陝甘游擊戰區，因此讓共軍的敵後勢力有自由發展的空間。

然從整個戰爭發展看來，軍事戰役仍在軍事委員會的指導下進行，惟在關於軍事目標與事實之間，在評價上仍須要區分清楚，才不會模糊了中國抗戰的歷史地位。

肆、韓永利教授談中國戰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位置

戰時美國根據軸心國的實力狀況，以及戰時地緣政治因素，確定了「先德後日」的戰略，目的在於分化軸心國相互間的戰略合作，同時在地緣上阻止德、意與日本的戰略連接，從而達到首先擊敗德國，然後擊敗日本的戰略目標。美國「先德後日」戰略的運行分為四個階段，而每一階段都與中國戰場的作用相聯繫。

一、中國戰場與美國的戰略制定

由於 1940 年 5 至 6 月間英、法在歐洲大陸為德軍所敗，日本又計劃南進侵略太平洋地區，這樣美、英就面臨著在兩洋同時應

對戰爭的局面。鑒於美、英迅即的威脅來自德國，也考量德國與日本的實力，美國設計了「德國第一」的原則。後來蘇、德戰爭爆發後，日本因為在中國戰場上被牽制，無法進行戰略調動以配合德國擊垮蘇聯。在中國戰場的支援下，美、英也在太平洋方面得到了相應的戰爭準備時間。因此，美國羅斯福總統將中國戰場與美、英大西洋航路維持並列為世界兩大戰略支點，同時也將其納入到應對日本南進總體框架中。

二、中國戰場應對美國的戰略調整

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初期，美、英遭到重大失利，美、英被迫調整戰略，除延緩原實施對德國進行戰略包圍的計畫，先應對太平洋方面的危機，再維持「德國第一」的戰略原則。如此中國戰場背負牽制日軍的重責。中國先是截留了日本在太平洋繼續擴大進攻的後續戰略兵源，其次是牽制日本繼續向印度進擊，有力地支持了美、英維持住太平洋與印度的防禦底線，既穩定太平洋戰局，又堅守「德國第一」原則的預期戰略。

三、中國戰場在美國戰略實施的發揮

1942 年美、英開始執行「先德後日」戰略計畫，欲包圍德國、援助蘇聯，但必須穩定亞太方面以支撐戰局。中國除繼續將日本陸軍主力牢牢限制在中國大陸，使其不能做任何大規模的戰略調動外，並且須作為美軍在亞太區域重型轟炸基地，以支援美軍在

太平洋戰場從防禦轉入有限進攻的行動，符合美國欲「保持中國於戰爭之中」的策略。

四、中國戰場與同盟國的勝利

1944年6月美英在西歐正面開闢了反攻德國的第二戰場，使德國受到東西兩面的反攻，可以說實現「先德後日」的戰略目標。然在太平洋戰場的美軍，和蘇聯在遠東的反攻，為了爭取時間，仍需要中國戰場牽制打擊日本陸軍主力。其後在德黑蘭會議與雅爾達會議上，都明確提出盡力「保持中國於戰爭之中」，作為反攻期間的重要戰略。中國戰場在撐住日本發動的一號作戰後，爭取到了時間和有利地位，成功把盟國的戰略重心轉到遠東太平洋，而獲得最後的勝利。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美國對華都有軍事援助，雖與中國所期盼的有相當落差，但不能不視為一個事實。不過在美國先德後日的戰略中，確實需要中國戰場的支撐，並且對縮短戰爭日程絕對起到作用。可說美國的支援是有的，但也因此讓中國戰場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總結上述，中國戰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格局中，是主要組成部分之一。中國與美國

及其他盟國之間的關係是相互支持，相互支撐，並且戰略互補。

伍、張瑞德教授談中國崛起現象對抗戰史的影響

中國的崛起，一方面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和商機，另一方面也由於其積極介入國際事務，也造成許多國家的疑懼。不論是前者後者，均對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軍事史（甚至一般史學）的教學與研究方面，也不例外。美國的軍事院校，普遍開設中國軍事史，甚至中共軍事史的課程，而臺灣的軍事學校，則只見到在深造教育時才有中國戰史的課程，軍官養成教育中仍尚未認識到軍事史的重要性。

在軍事史研究方面，英美學界今年（2012）年有兩種新的學報創刊，一是 *Journal of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另一種是有關全球軍事史的刊物。此外，劍橋大學即將出版的《劍橋戰爭史》（*Cambridge History of War*），主編之一即為研究中國軍事史的學者，顯示中國軍事史的研究越來越受西方主流學界的重視。



（左起）韓永利、彭敦文、段瑞聰教授（攝影 / 吳俊瑩）

至於中國崛起後，中國軍事史研究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課題，其中之一即為傳統中國的戰時文化。過去的教科書對於唐宋以後向南方的開發，以及疆域的開拓，無不是視為盛世的功業。但是近年英美學界利用少數民族的史料，顯示被「開發」的少數民族和周邊國家對中國，似乎並非是心悅誠服，而是視為一種「帝國主義」。戰後中國取得世界「四強」的地位，則開始積極介入周邊國家及地區的事務，這引起英國的疑懼，也曾被稱為 Chinese imperialism，此項新興話題至今仍不斷有新的研究出現，值得臺灣學界重視。

近年來由於蔣介石日記的開放，臺灣學界興起對蔣介石研究的熱潮，對於國民政府史的研究反而較少，以本人最近寫一篇討論戰前十年國民政府的文章，即發現近年相關的研究甚少。過去對於戰前國民政府的評價，不論是正面或負面，大多十分籠統。事實上各部會的治理效能不一，其治理技術包括人口資源的調查、地籍的整理、統計事業的應用、會計審計制度的建立等，有仿效美國的行政效率運動，也有仿效俄國的工作競賽，國民政府如何挪移外國統治技術，施行成果如何，這都是值得開發探討的問題。

陸、彭敦文教授談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外交策略

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這一段時

間內國民政府外交的運籌，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來看：第一個階段是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第二個階段是七七事變開始到武漢會戰時期；第三個階段是從武漢會戰結束到太平洋戰爭爆發。

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可稱之為妥協外交階段。國府雖採妥協態度，但其決策都根據對主要大國和國際組織動向的分析和推測，並且亦隨國際形勢的變化而調整策略。比如國聯外交、經濟外交、宋子文訪美、推動中蘇關係發展、加強中德關係等等，都是盱衡各種矛盾關係及其發展趨勢下的對策。

七七事變開始到武漢會戰時期，是確定「長期抗戰」為基本外交戰略的階段。中日全面開戰以後，國民政府一是根據抗戰需要推動中蘇關係的發展和穩定中德關係；二是在全盤規劃的基礎上密切關注歐洲局勢變化，注重大國對日政策變化的基本原則；同時也提出總的外交戰略是，多交與國，孤立敵人，循國聯的路線前進，造成與英、美、法、蘇聯合的形勢。

武漢會戰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為審慎因應、取得突破的階段。這一階段上，國際局勢瞬息萬變，錯綜複雜。國民政府關注歐洲局勢和美國的每一個變化，反復推敲，在堅持抗戰和揭露日本對世界危害的前提下，適時提出軍事合作的戰略，爭取同盟各國平等的地位，使中國擺脫了九一八事變以來所處的外交險境，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最後戰勝日本，奠定堅實的外交基礎。

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的整個時期，國民政府外交戰略總體上是值得肯定的，雖也有發生錯誤的決策，然卻是沿著基本穩定的路向前進。尤其是全面抗戰開始以後，準確把握戰略，為長期抗戰爭取了有利的條件，也充分發揮外交盱衡大勢、折衝樽俎的作用。

柒、劉維開教授談臺灣抗戰史研究的歷程

臺灣有關抗戰史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民國史研究中的重心，從 1970 年代開始有重要著作出現，如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完整敘述了抗戰的歷程，並使用一般人不容易看見的檔案資料，在當時相當具有學術價值。到 1980 年代，秦孝儀主持黨史會後，編修了一套《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其收錄重要且關鍵的資料，讓抗戰史研究進入新的發展方向。這可以從 1980 到 1990 年代期間，有關抗戰史主題的學位論文在數量上激增見得。可惜的是，在那之後逐漸沉寂，近年抗戰相關研究寥寥可數。

抗日戰爭對中國的歷史發展確實是相當大的轉折點。以黨國體制來說，抗戰造成黨治的崩解，國民黨在實質上不再指導監督政府，中央另成立國防參議會，邀請各黨派加

入政府，後又成立國民參政會，共議國是。如此打破訓政標榜的以黨領政規範，自不易再重建黨國體制，這也是戰後能迅速推動憲政的原因之一。此外抗戰也造成許多變化，如西北的開發，與大西部的發展，除有經濟、交通建設外，也帶動學術界對中國西半部的考察與研究。因此抗日戰爭始終都是一個重要歷史課題。

事實上仍有些議題亟待開發研究，這裡試舉一例。今年剛好為中山艦啟用一百週年，有相關紀錄片的拍攝製作，但在收集資料時發現並無太多新的研究。中山艦最後在 1938 年被日軍炸沉，由此延伸出海軍在抗戰時期的表現問題。但目前的研究成果顯示，抗戰史仍偏重陸軍研究，海軍與空軍的研究還是相當不足，因此難以進一步評斷其歷史作用。至於材料方面，臺灣典藏有上層決策性資料，地方性抗戰資料則以大陸檔案館為主。而軍隊的發展，也是常被忽略的議題。由於中國的軍隊派系混雜，地方實力軍人各占鰲頭，中央如何整編、擴編與縮編，而又是什麼原因造成黃埔軍在抗戰時期壯大、崛起，這些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抗戰史研究在臺灣近來雖然不是熱門主題，但還是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也有越來越多人倡議兩岸合寫一部抗日戰爭史，這是一個很具指標性的目標，不過前提還是要先放下黨派成見，拋卻意識型態才有可能。

捌、段瑞聰教授談日本關於抗戰史研究的問題

中國人和日本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日戰爭的理解不一樣，這是源自於中日對歷史的認識不一。日本人認知的戰爭，是「太平洋戰爭」，其戰爭對象主要是英、美。而中國人則將第二次世界大戰視為抗日戰爭，戰爭對象只有日本。

在日本從事中日戰爭的有兩大類學者。一類是從事日本近現代史研究的學者，一類是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學者。從事日本近現代史研究的學者，有的人不懂中文，而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學者，則對日本近現代史方面的研究關注不夠，這都會影響到研究的視角與解讀問題，中、日應加強交流，互相取長補短。這樣才能全面地理解中日戰爭。

再是資料利用問題。日本很多資料都能在網路上下載，臺灣的史料開放也是日新月異。目前可見的《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已經由國史館出版到第62卷，蔣的《蔣中正總統五記》也已經出版。大陸方面較為可惜，尚有許多檔案未開放，並且至今為止，還不能召開以蔣介石為名的學術會議。另外，抗戰研究若不參考日文資料，其研究成果難免有局限。

至於有關評價抗戰的問題，來自武漢大學的幾位學者都強調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所起的作用，不過對由誰指揮對日作

戰，制定外交政策，大陸方面多是避而不談的。本人則認為很大程度應歸功於蔣介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雖成為四強之一，但蔣介石深知中國實力不足，因此審時度勢，周旋於美、英、蘇之間，並積極參與聯合國成立，最終使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這是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得的最大的外交成果。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研究蔣介石及其外交戰略是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最後應該擴大視野，以全球史觀看歷史。特別是抗戰史，海峽兩岸首先須要達成共識，同時與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學者交流，逐漸擺脫仇恨情結，以利更客觀公正地理解歷史。

玖、島田美和教授談日本的殖民史角度

本人的專長為蒙古史研究，在此提出日本殖民史的觀點。也就是用日本史的角度，由殖民地看待中國抗日戰爭以及此時期的日本應會有不同的視野，另一方面，也可以由亞洲或東亞的概念去理解中日戰爭，或中國與日本的亞洲主義差別之處，也就是以一種超越國家的概念去看中日戰爭，或許可以有不同論點。

拾、綜合討論

劉熙明教授

最近幾年我在研究敵後戰場的領導權問題。在資料上，臺灣的國史館多集中在政治方面，剛剛大家討論到的問題，包括軍隊歷史、戰爭的社會問題等，需要參考中國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的資料，因此近年來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以中國大陸為主，也認為中共領導了敵後戰場。但問題是，敵後戰場若是在中共主導下，國民黨的武力到哪裡去了呢？對國民政府來說，游擊戰是一定要佈置的，事實上從華北淪陷後，國府就有考慮在敵後戰場打游擊，但因中共組織嚴密、情報能力強，日本一直把中共視為潛在的敵人。在武漢會戰後，中、日進入相持階段，日本在其控制區內實施治安作戰，同時要面對國、共兩股勢力，雖然國民黨的游擊軍力非常薄弱，但日本考量到若打垮國軍，讓共軍進來怎麼辦？因此關於敵後戰場的領導權問題，還是需要更多的個案研究。

蕭李居助修

這裡想就議題與角度提出一些想法。在議題上，軍情局最近開放了情報相關資料，提供一個研究方向。目前所見的研究成果多只討論到情報組織，但關於當時領導階層怎麼運用情報資料還沒有人專文討論。中統局與軍統局將對日作戰情報送到軍事委員會或是蔣中正手中後，蔣如何評估與運用呢？

大陸學者曾使用《徐永昌日記》，探討徐永昌個人研判情報資訊的看法，但可惜的是並沒有說明情報的來源與內容，也就難以判別其正確性與使用效率。至於角度部分，大家剛討論的都是中國的角度，我認為可以再思考日本的角度。日本參謀本部在戰前的1936年6月擬定「國防國策大綱」，經五相會議審核通過，這是日本因應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的應對方針。參謀本部同時擬定「戰爭準備計畫方針」、「對蘇戰爭指導大綱」與「日滿五年產業計畫」三份配套方案，隨即陸軍省也針對這三份配套方案於同年11月制定「軍備充實計畫大綱」。也就是說雖然當時日本國防針對的對象是蘇聯，但是這些國防計畫關於到日本對中國華北地區資源的掌握，而這就牽涉到戰前中日關係愈來愈惡化以及之後中日戰爭爆發的始因，因此關於日本的角度我認為是不能忽略的。

吳淑鳳協修

齊錫生教授在去年的新作《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中美軍事關係》，提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國給予中國是道義上的支持，實際支援是很少的，即使在戰爭爆發後，中、美成為作戰盟友，但美國的支援仍是有限度的。美國的目的不是裝備中國軍隊足以獨立對日作戰，而是透過史迪威到中國戰場領導中國對日作戰。其次，探討中國戰場的的地位問題，若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應該以中國將日本陸軍戰力牽制在中

國戰場的作用，與歐陸戰場上盟國牽制軸心國的效力進行比較，才能真正評判中國戰場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最後，關於議題的開發，我曾在廣東省圖書館看到戰後的地方報紙，有為數不少的報導，是關於戰時廣東婦女嫁給日本軍官，在戰爭結束後，這些婦女被地方人士視為犯了通姦罪，甚至直接動用私刑，婦女完全沒有受到保護。我想關於戰時婦女的權益及其遭遇是未來值得探討的課題。

拾壹、呂館長閉幕致詞

時局的變化往往會影響到歷史研究的趨勢，大國崛起後有關中國議題的討論確實有很大的改觀，蔣個人對抗戰也有很多記錄與想法，若《蔣介石日記》公開後，對抗戰史研究一定會有影響。要推展抗戰史研究，事先的準備工作還是不可少，包括史料的介紹、公布，以及書目的回顧反省與檢討等。這些都需要逐步的進行，期待往後能與各位學者有更多的合作與交流。

出版資訊



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

編輯：吳淑鳳、許瑞浩、張世瑛、蕭李居等
2011年6月初版
書籍每冊500元
電子書每片250元

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中美合作所的業務

中美合作所由軍統局與美國海軍部及戰略局合作組成，本冊收錄該所業務內容，包括裝備及訓練部隊、情報和特警人員，架設無線電台，建置中國各地情報網，供給盟軍氣象資訊和偵收破譯敵方情報等工作。

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軍統局隸屬機構

軍統局組織龐大，隸屬機構繁多，本冊收錄運輸統制局監察處暨所屬公路機構、水陸交通統一檢查機構、交警機構的權責職掌、組織調整及整編過程。

訂購詳見「國史館出版品銷售處」
(頁264)